

MAKESI ZHUYI WENBEN
YU XIANSHI DE DUIHUA
TAN PEI WEN ZIXUAN JI

A81-53/8

谭培文 著

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

——谭培文自选集

究竟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呢？这关系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个一直被悬搁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而且需要首先回答的论题。

甘肃人民出版社

MAKESI ZHUYI WENBEN
YU XIANSHI DE DUIHUA
TAN PEIWEN ZIXUAN

谭培文 著

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

——谭培文自选集

究竟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呢？这关系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个一直被悬搁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而且需要首先回答的论题。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谭培文自选集 / 谭培文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4
ISBN 978-7-226-03668-6

I. 马… II. 谭… III.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集
IV. A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4488 号

责任编辑：党晨飞

装帧设计：马吉庆

马克思主义文本与现实的对话——谭培文自选集

谭培文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6.75 插页 2 字数 283千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978-7-226-03668-6 定价：29.00 元

代序

文本乃治学之本 现实为创新之源

——纪念和弘扬孙伯鍤先生的学术精神

师从孙伯鍤先生，是我走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常值得津津乐道的话题。大凡考生都有这样一种心理，不见导师很神奇，见了导师又平常。考博以前，经常看到他的著作和论文，经常有人谈论南京大学的孙伯鍤先生，从而下定了追随孙先生的决心。然而，当我成了孙先生博士生以后，从外表来看孙先生，孙先生同样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孙先生简朴明快，敏于事而慎于行，待人勤恳，和蔼可亲，十分平常。那么，跟随孙先生究竟学些什么？我又开始有些迷糊了。孙先生学养优良，学识渊博，文本功底深厚，是我所欲也；孙先生思维敏捷，论辩精当，鞭辟入里，是我所欲也；孙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是我所欲也……这些都是基本的，皆为我欲追求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是他的学术精神。

孙先生主要的学术精神是什么？孙先生崇高的学术精神不在他的生活世界之外，其实也就在他的学术生涯的平常之中。从孙先生日常的学术生涯来看，其主要特点是敏于事而慎于行。而在敏于事和慎于行之间，首先是“慎于行”。所谓“慎于行”，对于学人而言，决不是要像孔子的传道者所说的那样，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儒家礼教中的人。这里的“慎于行”，主要是指孙先生治学方面的严谨，坚持文本为治学之本的原则，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这似乎为专家学人的常规之则。但是，在当代要做到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孙先生却是躬

身厉行、矢志不渝。在这一方面，孙先生正确地处理好了四个关系，即本与末关系，功与用的关系，述与作的关系和冷与热的关系。

1. 冷与热的关系

冷与热的关系，如果严格地从学术精神上来看，它应该是四种关系中最末的一种关系。但是联系到孙先生所处的时代，它是当时专家学人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关系。20世纪末叶，我国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学术界浮躁之风逐渐加剧。“斯文”做研究的不如扫地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做学问注重文本的人越来越少。板凳要坐十年冷似乎已经不合时宜，热的是“下海”捞钱，为评职称而去掏钱发文章，哪里还有什么真正的学术研究？孙先生就是不为世态炎凉所动，板凳一坐十年冷，咬定青山（马克思主义文本资料的研究）不放松，永不停息地日日夜夜地研究和探索。他写作的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著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1985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可以说，就是他本人从早年一个人在北京大学从教（当时他的家属在江苏工作），后来（“文化大革命”后）到南京大学工作，数十年坐着冷板凳探索马克思道路的艰苦探索。

2. 本与末的关系

在研究中，什么是本？什么是末？这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在学术浮躁的现代，它却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做研究，不看原始资料，只阅读第二手资料。还比如，有的人批评马克思，但是马克思的文本并没有真正地认真读过。研究风气竟然如此，孙先生对此十分反感。在当代，由于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复杂原因，在马克思逝世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不同，已经出现许多不同的流派，在国外，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更是百家争鸣，东西南北各不同。孙先生认为，马克思不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流派，这是正常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不能莫衷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才能比较正确地反映马克思的思想呢？如果马克思还在，马克思自己当然可以出来讲话。然而，“昔人已乘黄鹤去”，马克思早已辞世，那么，从研究马克思的视角来看，就要《走进马克思》（孙伯鍨、张一兵著：《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而各个流派的不同观点，只是本之流末而已。

3. 功与用的关系

所谓功与用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孙先生培养博士的思路。孙先生认为，培养博士阅读文本的能力，这是治学之本，也是博士的“功”，而写文章只是这种“功”之“用”而已。20世纪90年代，南京大学对博士开始试行一些新的规定，那就是博士在读期间，必须要在南京大学指定的国家一流期刊上发一篇论文（理科则要求必须有进SCI索引的论文），在省以上的公开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这一规定对我们的压力真是太大了。当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博士生，三年寒窗含辛茹苦，最后竟与博士学位失之交臂。而在孙先生看来，这只不过是个功与用的关系问题，因而，关键还是要读好文本，练好内功。练好了内功，不怕发不了文章。在那样的一个万马齐喑的紧张气氛中，孙先生这一席话，不仅没有缓和我们的紧张气氛，而且还为我们的这种气氛增加了几分紧张。他要求我们，凡硕士不是在南京大学读的，除开读好博士要读的文本之外，还要求去听硕士的原著课。追随孙先生，我们整天整天都是读书而已，我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的哲学著作，等等，读书笔记共做了20多本。虽然苦了，但是，到了后来，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进入南京大学之初，有如“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是最初的境界；在孙先生指导下，日复一日地读书和做笔记，练功的过程，正是历经了一个“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练功的过程，这是第二个境界；只有最后才可以说，开始感觉进入了一个“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新的境界。

4. 述与作的关系

“述”的本来含义应是谈话和陈说，我在这里把“述”引申为研究，因为学者的课堂陈说，与本人的研究原本就是一回事。而“作”就是发文章。个人研究和发文章也应是相互统一的，有研究就可以发文章，没研究当然无文章可发。当然，在古代也不乏一些特例。苏格拉底是述而不作。孔子的《论语》，也不是孔子自己发的文章，而是他的学生后来根据其述而作。可是，在当代，这个问题就离谱了一些。没研究的因为有钱，可以拿钱去买版面发文章；有研究的因为没钱，有文章也可能无处可发。在这个问题上，孙先生始终把研究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发文章的多少。在他那里，不成熟的东西他决不会随意拿出来。孙先生有一种只求研究，不求闻达的精神。

所谓“敏于事”，这里的“敏”，是敏感、敏锐的意思；这里的“事”，是现实存在的事物；“敏于事”，是指孙先生关注现实，对现实有所敏锐的洞察力，把现实看做是创新之源的学术精神。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源于时代，哲学又高于时代。哲学是时代的精神，是说哲学源于时代；哲学高于时代是指哲学不是简单地对时代精神的机械地复写，而是对时代精神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对时代精神的再创造，最后，提炼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而，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现实与创新之间，现实是创新之源。孙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强调“走进马克思”，又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由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孙伯鍈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三卷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1992年），其面目比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如果说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它有较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孙先生的学术精神青（此处若用“罄”显然不妥，借“罄”谐音而用之）竹难书，他所倡导的“文本乃治学之本，现实为创新之源”，也未必真正代表他的学术精神。因为，充其量这只能算是我对孙先生的学术精神之拾零而已。尽管孙先生的学术精神，在我国的学术精神宝库中只是一滴水珠，但是我国的学术精神宝库就是由这些无数的小水珠汇集而成的。一滴水珠，在太阳的照耀下，也照样会发出灿烂的光辉。

《诗经·小雅·车辖》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引《史记·孔子世家》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孙伯鍈先生的学术精神永放光芒！

是为序。

谭培文

2008年1月

于桂林寓所

* 本文原载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编《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之《探索与反思——哲学家孙伯鍈》，张异宾、唐正东编，217~22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代 序:

- 001····· 文本乃治学之本 现实为创新之源
——纪念和弘扬孙伯鍈先生的学术精神

► 第一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003·····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
015·····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界域的哲学厘定
023····· 3. 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036····· 4.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的价值因素及其意义
046····· 5. 发展与代价二难悖结的哲学沉思
050····· 6. 当代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济哲学视角探索
——兼析新自由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学悖论
058····· 7. 新自由主义理论传统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审视

► 第二编 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研究

- 069····· 1. 利益是马克思最早发现走出唯心史观魔谷的阿莉阿德尼之线
078····· 2. 利益范畴的历史嬗变与现实解读
086····· 3. 利益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疑难的戈尔迪之结
097····· 4. 物化观与马克思问题域的逻辑转换
108····· 5. 人类的利益是发展生产力
117····· 6. 马克思的利益观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撞与融合
127····· 7. 孔杨墨的利益观的现代阐释
139····· 8. 邓小平的利益观
149····· 9. 对和谐社会的利益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 第三编 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 163····· 1. “唯一者”与马克思的个性观
170····· 2. 现实的个人: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端
——论施蒂纳哲学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影响
180····· 3. 马克思论人的科学方法研究
193····· 4. 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
204····· 5.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的价值导向
212····· 6. 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与现实的二难解读
222····· 7. 日常生活世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平台
231····· 8. 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人道化道路的哲学探索
235····· 9.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当代价值研究
247····· 10. 论世纪之交的实践向度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目的的哲学沉思

► 后 记

- 259····· 后 记



I

第一编

MA KESIZHUYI
ZHONGGUO HUA
YAN JIU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何以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事实上已经进入国人的日常话语系统。这个命题一诞生，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就在国内外遭到了来自政治的、学理上的各种诘难，认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有一个内在的悖论一直未予以澄清。其理由是，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它就应该如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是普遍适用的，不存在因国家、民族的情况不同而具体化的问题，因而，没有中国化的数学、物理学等，也不会有什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然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是普遍真理，而且马克思中国化为一些人滥用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前一种理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一种观点实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甚至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中国儒学传统的改头换面，无非是“井田制的翻版”。究竟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呢？这关系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个一直被悬搁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而且需要首先回答的论题。

一、马克思主义是否需要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需要中国化，它何以不像自然科学的公式那样是普遍适用的呢？在这里，首先关涉的是它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问题。马克思主义按其学科属性可以规定为广义的人文科学。广义的人文科学“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①可见，人文科学归根结底是对不同文明形态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基础原则、研究价值以及研究的时空界限方面是不同的。

1.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完全不同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人文科学则首先离不开人。人与自然最本质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305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的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懂语言、能劳动的现实的个体。对人类精神，即理性的研究，成了人文科学，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重要内容。黑格尔把理性主义推上一个高峰。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人文科学，如哲学、历史学等，研究的是精神，自然科学则研究自然，自然与精神是不同的。自然只有变化，没有发展。发展的实质是扬弃，即克服和保留，保留体现出连续性，克服体现出超越性。发展是一种连续和超越。自然的变化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自然界里，“太阳下面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所以，自然的变化只是自在的，只有精神的变化才是自在自为的。“精神的发展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并且同时是自身回复的过程。”^①黑格尔把现象仅仅看做一种精神现象，是其唯心的。但是，他把精神与自然对立起来，实际上阐明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按狄尔泰的观点，自文艺复兴以降，人文科学形成了一个与自然科学并列的独立整体。狄尔泰像维科一样认为人文科学的可能性的首要条件就是研究历史的人或创造历史的哪个人。人文科学的核心范围是精神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可以这样表述：“精神能理解的，只是它已经创造的东西。自然界，物理科学的对象，则包含着独立于精神而出现的实在。人主动打上其印记的一切，构成了人文研究的主题。”^②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和实在，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主动打上其印记的一切”。当然，这种印记，不只是狄尔泰的精神的印记，而是人类自觉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的痕迹。所以，社会发展史与自然的发展史是不同的，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彼此的相互作用，反之，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③

2.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基础原则不同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自然科学的学科目标是追求精确的事实，以事实为基础进而“求是”。所以，自然科学的学科基础原则就是数学。而人文科学则不同，它不仅要从事实出发进而“求是”，而且要阐明其“应当”，即人的有目的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人文科学不能用“常量”来计算，其学科的

① [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② 转引自[挪]G·希尔贝克等著，童世俊等译：《西方哲学史》，40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基础原则只能是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基础原则界定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一门科学只有用数学来计算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恩格斯认为,在古希腊,最早的自然科学只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但是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等。近代天体力学首先发展起来了,但同时为它服务的,“是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恩格斯说:“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已臻完成。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定了;主要由笛卡儿确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确立了对数,莱布尼茨,也许还有牛顿确立了微积分。固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一举弄清楚了。”^①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实个人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生产本身又分两种生产,即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一方面,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其下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受着这两种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制度的能动作用,因而,人们的任何有意识的活动就有其价值和意义的评价。人文科学通过对人类行为的价值和意义评价来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于这一点,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通过内心体验构成价值和目的,而自然科学则仅仅局限于事实的范围。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意义是通过人文科学的认识赋予的。他说,这种“内在体验的科学就包含了决定自然存在于我们的认识论原理,以及解释各种意图的存在、最高的善和价值的我们行动的原理;我们所有应付自然的实践行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②他还认为,孔德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真正基础是一种粗糙的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孔德的错误在于把人文科学归结于自然科学,把精神现象归于自然现象,把人的高级能力降低到动物的低级能力水平,从而遮蔽人的行为的价值和意义。狄尔泰把人文科学的价值和意义仅仅看做一种内心体验当然是不确切的,但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人文科学解释了人的实践行为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正确的。

3.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原则的适用范围各不相同

自然科学所最追求的是对现象的说明,因而自然科学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具有相对的超时空性。它可以不受社会历史条件、民族传统习惯和文明形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德]狄尔泰著,赵稀方译:《人文科学导论》,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限制或影响。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牛顿的力学原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人文科学就是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科学。人类社会也像自然一样，也受其内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但人是社会、民族和不同文明形态的产物，所以人文科学的原则往往受社会历史条件、民族传统习惯和文明形态的限制或影响，不存在万世不变的普适标准。这一点事实上从维科开始、经过休谟的质疑和后来历史主义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对其作了科学的论证。维科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具有不同质的研究对象，因而也具有不同质的研究方法。休谟对人文科学的理性普适性倾向提出了质疑。康德由此得到启发，对人类理性的适用性范围进行了限制和界定。19世纪的人文科学成了历史取向的学科，人文科学各分支被历史化了。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赫尔德引领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化的趋势。“他是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最杰出代表，这种历史意识蕴含着一种新的个体感和历史变化感。后来所谓历史主义的核心即在此。”所谓的历史主义的个体性不是局限于个人或特殊现象，而是指“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也是某种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东西^①”。

在这里，历史的个体性实际上是开始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历史的一种真正的哲学理解，因为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从个别、特殊开始的。这一点也是中世纪以来唯名论的传统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影响。问题是，历史的个体性是如何可能的？这种个体性是由于外在自然的作用，还是其内在的矛盾运动？历史主义虽然拒绝从外在的自然来解释个体性，但它们把个体性归结为不同民族、不同的人性（赫尔德）和精神或自我意识（费希特）。尤其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性的历史变化感通过自我意识的自我运动才真正突现出来。在他看来，不同的历史实体的历史变化是由不同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决定的，世界历史的变化过程，就是一个自我意识自我运动和上升的过程。这种从人性和精神来解释历史个体性的历史性，其历史变化感也不是真正的具体的历史性。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对其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他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市

① [挪]G·希尔贝克等著，童世俊等译：《西方哲学史》，39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国家。”^①可见,所谓社会历史的个体性,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人类、民族、国家、家庭和文明形态存在方式变化和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状态和特征。

社会历史的个体性所揭示的文明形态的特殊性在当代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中更加突现出来。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一方面反对以民族国家或人类全体一般作为研究单位,另一方面又将世界26个不同文明形态的变化和生长整体性和个体性结合起来,并分析了这些文明形态发展和衰落的内在原因。汤因比的合理之处在于他把文明的变化和生长比作一个生物有机体,但他并没有像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把文明的变化和生长公式化。美国的亨廷顿把未来的世界冲突归结为不同文明的冲突,在此暂不评论其理论得失,但其从一个侧面表明,全球化中的某些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原则必须有一个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它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所以,人文科学既要研究人类社会一般规律,同时又要从这些不同社会、人类、民族、国家、家庭和文明形态不同的具体状态和特征出发。人文科学只有将其二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具有其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是毫无疑问的,但马克思主义是人文科学,它要成为某一民族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即同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个民族、国家的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和文明状态和特征结合起来。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原理普遍有效性,而且正是普遍性的内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能

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胜利。可是在国外却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儒家社会主义,封建的农业的社会主义等等。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中国是否实际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如果对它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可能的;否则,就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本已成为人们生活常识的话语又常常为人们所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再次成为我们不得不首先要解答的第一个问题。

在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就有数十个，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却被一些人歪曲为（“铁托”式的）修正主义等等。在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和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研究热点问题。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历史性解读者认为，以恩格斯《反杜林论》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经典文本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表现。它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组成部分、内容极为丰富和深刻的严整思想体系”^①。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出发，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其理由是，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逻辑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界定为社会发展学说。“社会发展学说大致可以包括这样三种成分或三个具体学科：理想学说、现实社会的批判学说和历史哲学。”^②其实，整体性方法不是这两个定义分歧的根本，庄福龄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分析成三个部分并没有割裂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联系。其要害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究竟突出的是其历史性，还是其当代性？显然，庄福龄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文本的基本精神，而后一种理解更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是，究竟从何种研究视角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在我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科学理解，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也必须凸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内涵的基本根据。离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就失去了前提，对其内涵的规定就是不可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及其价值和意义。离开了当代性，马克思主义就同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失去了联系。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

① 庄福龄主编：《简明马克思主义史》，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② 郝敬之：《论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2）。

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是否可能，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是何以可能的；历史性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根据，当代性可以证明和显示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在当代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所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当代性统一起来，我们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作出科学的规定。

以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为根据，要解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仅仅了解它有三个组成部分还远远不够，问题是，这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关系究竟如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实质？这一问题不澄明，就可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用来充当马克思主义；把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成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的，它们的实质和核心是现代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不仅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都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核心。这是十分正确的。他说，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创新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发现是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但是，这两大发现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哲学方法论。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找到了社会发展的手段和途径。“现代社会主义”从此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就是以现代社会主义为核心等三个部分组成和统一起来的社会发展理论。现代社会主义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和实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不是一般的社会发展，而是指以现代社会主义为标志的社会全面发展。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泛化为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那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性根据。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现代社会主义。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而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所以，问当代中国是否有马克思主义？首先应该追问当代中国是否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但是，“现代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对其科学规定，既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